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党如何倡导

□ 楚向红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准确把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变，不仅使党走向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而且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党的政策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党的政策策略也随之进行调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之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面抗日战争。随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渐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策略的转变。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并与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自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发表，提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等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了国民党内抗战派的赞同。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基本接受了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以斗争求团结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全民族抗战中，国民党蒋介石

集团一方面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其反共的立场并没有随着抗战而改变，时刻企图在抗战中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因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但斗争必须以不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底线。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各界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争取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1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提出了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的必要步骤：政治上全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但暂时不提蒋介石的名字；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军事上采取防御战；在组织上拟撤退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要求国民党顽固派悬崖勒马、停止挑衅、释放叶挺、惩办祸首等。1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要求新四军将领广为散放就取通电和声讨亲日派声明，在党内外尽量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但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暂时不提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名字。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使蒋介石集团政治上陷于空前的孤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在3月初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坚持抗战中壮大人民的力量，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对统一战线的破坏和对日本的妥协动摇保持足够的警惕，进行必要的斗争，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通过斗争逼使蒋介石集团留在抗日阵营内，维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为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走向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与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形象，扩大了党的威望与影响。

本来，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开创了大革命的局面，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然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这个昔日盟友及其支持者大加杀戮，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拿起武器与之进行抗争，于是国共两党之间有了近十年的军事对峙。在这一过程中，无数革命者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刑场上、牺牲在国民党军队的炮火中。可以说，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近十年的内战中，每一个党员都有自己的亲人、战友为革命而牺牲。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及时调整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共产党人坦荡的胸怀，看到了共产党人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忠诚。

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军队人数虽然不多，又地处贫瘠的西北高原，但人们从共产党人高尚的政治品格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中，看到了其人格的力量，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党不仅能成为全民族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也能够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柱石。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有限的；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形成，人们对共产党也由同情逐步转变为拥护和信赖，拥护的是共产党的主张，信赖的是共产党的品格，这也使我们党从狭小的天地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纵横决荡斗敌顽

——新四军第二师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杨佳斯

新四军第二师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在安徽省定远县藕塘镇境内。纪念碑始建于1944年7月，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悍然进攻解放区，野蛮炸毁了该烈士纪念碑。1964年当地政府重修纪念碑，碑文如下：

一、立碑以志的目的，读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梅花桩”战法首次亮相

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坚持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任师长兼政委，下辖四、五、六三个旅。新四军第二师成立后，坚持敌后抗战，活跃在江淮河汉地区，纵横决荡于皖东路西，构筑起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

皖南事变后，日寇加紧了对津浦路两侧新四军根据地的“扫荡”，第二师及时总结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灵活运用包括阻击、扰乱、纠缠、伏击、歼灭等形式多样的游击战术，创建了让敌闻风丧胆的“梅花桩”战法。“梅花桩”战法的精华就是化整为零，把主力部队划为一个个精干的战斗小组，像钉在地上的梅花桩一样纵深分布，同时高度注意各战斗小组之间的步调一致、协同作战。

1941年4月，“梅花桩”战法在六合县金牛山首次亮相。金牛山地下势起伏，村庄密集，便于各战斗小组隐蔽接敌。4月17日拂晓，日军选择走田间小路，偷偷进入二师防区，却被二师流动巡逻的一个战斗小组发现，金牛山战斗即刻打响了。罗炳辉主持编写的《战斗详报》，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战斗场景：“敌人以爬行沿田埂秘密接近我军，当我军事哨发觉开枪即打，敌人向我猛冲，我即与敌展开血战。因我军部署是梅花桩式，敌人不能包围我，反而为我包围。”到了早上7点，二师主力部队大举反击，经过一番激战，成功地将战线向前推进了10多公里。日军为逃脱失败的命运，对新四军进行疯狂反扑。新四军“梅花桩”战斗小组组成突击班，四面开花，先后干掉了敌人的重机枪手，摧毁了日军的掷弹筒小组。仅半天时间，共打死打伤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生擒日军2名，活捉伪军30多人，缴获武器若干。新四军战士牺牲54人，在敌强我

杰出的新闻战士范长江

□ 宋守山

一点东西”，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中国的出路，在我看来，是找到了”

1932年秋，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年开始为《北平晨报》等撰稿，由此走上新闻道路。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京津两地日军横行，范长江意识到“原定的从读书中找中国出路的方针，行不通了”。他“很想把自己所见报告出来，提起国人的注意”，这是他成为新闻记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范长江主张记者要有抱负，“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当时的问题有两个，那就是红军北上后中国的动向以及抗战后西北的状况。为回答这些问题，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自天津只身北上，经青岛、上海至重庆，而后自成都出发，经兰州、入祁连山，历时十月有余，足迹遍布五省，行程一万两千余里，撰写通讯百余篇，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考察。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早于斯诺《西行漫记》至少一年，是“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了解。

为深入了解陕北状况，范长江请求赴延安采访并获批准。1937年2月9日，范长江到达延安，当晚受邀在毛泽东的窑洞做“竟夜之谈”。这次长谈涉及“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重要问题。1969年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称，“这十小

弱的情况下，打出了1:10的战损比，“梅花桩”战法首战告捷。

怒惩伪顽

1942年，定远县大汉奸谢少臣和日寇狼狈为奸，组建了伪军部队，和日军沆瀣一气。谢少臣带领伪军，多次给日军引路，发动了大规模“扫荡”。日伪军劫掠百姓牛羊，烧毁百姓房屋，杀害无辜中国百姓，死难者达1000多人。活跃在定远县附近的新四军二师6旅18团团长陈庆先听说了日伪军在定远的暴行，义愤填膺，率18团赶到定远县郊区，耐心寻机歼敌。为了保证战斗胜利，陈庆先把目标锁定在战斗力较弱的谢少臣伪军部队，首先拔除谢少臣盘踞的日伪据点。

当天晚上，陈庆先亲率18团战士对谢少臣据点发起突然袭击，谢少臣措手不及、张皇失措，指挥手下拼死顽抗。陈庆先带头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很快就打下了谢少臣盘踞的据点。在激烈的战斗过程中，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左腿，他浑然不觉，仍指挥战士们奋勇杀敌。

18团终于攻占了敌人据点，击毙了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大汉奸谢少臣，陈庆先却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待鬼子援兵赶来，18团的战士们已经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抬着陈庆先顺利撤离了。经过几个月的休养，陈庆先才逐渐恢复健康。这次受伤，让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寸。从此以后，他走路时总是一瘸一拐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一个让日伪军闻之色变的“陈拐子”。

为有牺牲多壮志

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二师在淮南开创了拥有330万人口，3万平方公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并欣喜地表示“中国的出路，在我看来，是找到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范长江放弃写书计划，自西安返沪，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他不仅在《大公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通讯，还在《国闻周报》连载通讯《陕北之行》。《陕北之行》发表时恰逢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范长江的通讯令与会人员大为震撼，也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为推进新闻战线的抗敌斗争，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和胡愈之、夏衍等一批左翼记者建立了爱国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史称“青记”，即中国记协的前身。次年3月，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并于汉口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范长江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秋，范长江拒绝了《大公报》经理胡政之为其配备记者、专车、电台，但要“放弃拥护中共态度，要无条件地拥护蒋委员长”的要求，愤而离开《大公报》并与其代表的阶级决裂。

开创新中国新闻事业

离开《大公报》后，范长江开始了在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生涯。他创办通讯社、报纸，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范长江于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是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后在香港参与创办《华商报》并任副总经理。



里的解放区，建立了1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奋发忠勇，百战百胜。主力部队从一开始的不到3100人，发展到抗战胜利后4个旅11个团共35000多人。地方部队15000余人，民兵多达20万人。

新四军第二师在涌现出大批“陈拐子”式英雄人物的同时，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共有20000余人伤亡，至1944年立碑之时，就有790多名共产党员为国捐躯，其中包括了县团以上干部高敬亭、文明地、徐庚、王风岐等。新四军第二师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谱写了辉煌灿烂的抗战史诗。